



甘做革命的一块砖

——记抗日老战士任久利

核心提示

他16岁入党，17岁参加抗日游击队，21岁成为林伯渠的机要秘书，28岁起先后在国家档案局、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工作……34岁那年，他前来支援我市的档案工作建设，一年后主动放弃回京机会，从此全身心投入到我市档案工作中……

他，就是抗战老兵任久利。近日，本报记者走进这位耄耋老人，探寻他从炮火硝烟中走来的光辉足迹，感受一颗老共产党员的赤子丹心。

本报记者 陈作华 见习记者 张弛

告别妻子上战场

1928年7月，任久利出生在河北省武强县的一户农家。虽然家里有几亩田地，但都是肥力很差的土质，任久利姊妹四个从小就随父亲下地干活，全家人辛辛苦苦一年也收获不了多少粮食，全家人的生活只能勉强维持。

1938年，村里成立了抗日小学，11岁的任久利有了读书的机会。“那时候，鬼子隔三差五进村扫荡，学校上课断断续续，虽然在校时间有六年之久，但实际读书的时间只有三四年。”任久利说，“后来，村里有了维持会，维持会经常摊派村民去给鬼子修路、修炮楼、挖壕沟，我从15岁起就被派去干这些活了。”

“鬼子动不动就打干活的百姓，谁干活慢一点儿，就用枪托砸。我手里干着活，心里恨透了这些奴才小国人的侵略者。”任久利说，“抗日小学校长私下里常给我们讲抗日的道理，还特别跟我谈过几次话，问我怕不怕鬼子、敢不敢和鬼子干。我说不怕，只要能日本鬼子赶走，就是死也不怕！校长说，光嘴上说不行，还要立个字据。”

1944年12月的一天，任久利接到通知，校长让他晚饭后到一位同学家里立字据。“原来，那天晚上校长让我去写入党申请书。因为当时入党是秘

密进行的，所以校长就以‘立字据’的说法把我约去了。”任久利说，“写完入党申请书后，校长对屋里的几位同学说，从今天往后大家就是同志了，大家要紧密团结、保守秘密，宣传抗日、支持抗日。就这样，我在16岁那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”

“1945年1月，武强县抗日游击队到学校征兵，我立即报名参加了游击队。那时候，我刚成家几个月，妻子听说我要走，赶紧给我装衣服、拿鞋子，我连夜就随队伍走了。”任久利说，“妻子很支持我。那时候，很多家庭都是这样，你记不记得有首歌是这样唱的：‘母亲叫儿打东洋，妻子送郎上战场’。这就是当时的真实情况。”

游击队每天东奔西跑，任久利跟着队伍埋地雷、打伏击，寻找机会对敌人进行骚扰。由于有文化，任久利进步很快，1945年7月，他被派往冀中第八军分区学习机要知识，之后成为63团的一名译电员。

“1945年8月16日，是我一生中难忘的一天。这天下午，我突然接到电台讯号。当我译完电码后得知，1945年8月15日，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。接着，我发狂般冲到门外高喊起来：‘日本无条件投降了！’任久利站起身来激动地说。

曾在林伯渠身边工作

1949年11月，任久利被调到政务院（国务院）机要处，继续从事电报发译工作。1949年11月，任久利再接受调令，给“中共五老”之一、时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秘书长的林伯渠同志担任机要秘书。

“得知要给林老当秘书，我既激动又紧张。”提起这段往事，任久利仍然很兴奋，他说，“但见面之后，所有的紧张感都被林老的和蔼可亲融化了。那天我刚一进门，一位60多岁、面容和善的老者就坐在座位上站了起来，很客气地伸过手来和我握手，对我嘘寒问暖。林老除了叮嘱我工作中要注意的事情外，还建议我平时多学习政治、历史等方面的知识。”

“林老十分重视保守党的机密，对于机要文件都是随到随阅，阅后签字立即退回，很少隔夜退还。可有一次，一份机密文件找不到了，林老很着急，立刻放下手头的工作找文件，连找了几个钟头，把办公室几乎翻了个底朝天，累得满头大汗，结果还是没找到。最后，终于在我的办公室找到了那份机密文件。”任久利说，“我当时吓出了一身汗，心想这次肯定要被林老狠狠地批评了。没料到，他不但没有批评我，反而自责地说没有给我交代清楚该怎么处理这份文件。从那以后，我在林

老身边工作的几年里，再也没有出现过文件找不到的情况。”

“林老是个大学问家，跟他在一起，我学到了很多。”任久利向记者讲起了这样一件事。“一次，林老会见一位民主人士。这位客人问林老贵庚几何，林老说是属‘戌’的，客人未听清，回问了一句。这时，我在旁边插嘴说：‘属老鼠的。’林老瞅了我一眼，意思是说我的不对，就用手一指在桌子上写出了‘戌’字。我又随口说了一句‘啊，是属狗’s’。”

“林老瞪了我一眼，不再理我了。我以为林老生气了。没想到，客人走后，林老很和气地对我说：‘中国人讲话要注意用词文雅，对有些属相不宜直接说出，就用天干地支代替。你年轻，要多学习，不要在客人面前随便说话。’”任久利说，“这件事教育了我，深深地刻在了我的心里，至今不忘，时刻鞭策我要不断学习。”

“林老进北京后，延安的老八路作风并没有丢。他住在中南海颐园，就在勤政殿西邻，小院内有假山花卉，可他还要在空地上种些豆类植物，我经常跟他一起劳动。林老说，劳动既锻炼了身体，又获得了收成，一举两得。”任久利说，“我现在依然怀念在林老身边工作的那段日子。”

“淡泊以明志，宁静而致远”。在任久利的客厅里，挂着这样一幅字。这幅字也是他一生的写照。

1956年，任久利被调到国家档案馆人事处工作，次年调到国家第一历史档案馆，任档案利用组组长。“1962年的一天，领导找到我，说焦作是一个新兴的工业城市，有很多重要历史资料需要整理归档，问我愿不愿意去那里参加档案建设工作，为期一年。我立马就答应了。”任久利回忆说。

在哪儿都是干革命

“1962年7月，我第一次来到焦作，任市档案处副处长。当时，焦作市档案处刚刚成立，缺乏专业人才，工作没有头绪，各类档案就地堆放。”任久利说，“我一方面带人迅速开展档案整理归卷工作，一方面开办基层档案员培训班，指导直属各局委建立基层档案室。仅一年多的时间，焦作的档案工作就步入了正轨。”

“一年后的一天，我接到国家档案局领导的电话，问我想不想调回北京

工作。”任久利说，“在哪儿都是干革命，这里更需要我，我就在这儿不回去了。就这样，我在焦作一直工作到离休。”

“应当说，我选择留在焦作跟林老对我的教育和影响密不可分。他身为‘中共五老’之一，尚能以普通党员的身份过组织生活，在小组会上经常检查自己的工作、学习和思想情况，征求同志们的意见。林老为了按时缴纳党费，在每月的日历牌上写着：‘今天交党费’。他对党的事业无限忠诚，深深影响了我的一生。”任久利说。



任久利回忆当年的抗战岁月。

本报记者 陈作华 摄

如今，任久利依旧居住在老居民楼里，家里陈设简朴。他曾经的同事大都北京的干部楼里颐养天年，可任久利并不羡慕。他说，能为焦作这个新兴城市的发展做一点事情，感觉挺满足。

“父亲对世俗名利看得很淡，但关心国家大事。他最大的爱好就是每天翻开报纸看新闻，《焦作日报》是他坚持多年阅读的报纸。汶川和玉树地震时，父亲在报纸上看到新闻报道后，马上让我取出他的离休金去捐款。”任久利的儿子说。

采访中，记者从任老的言谈中能够感觉到他谦虚平和的心态。不以物喜，不以己悲，一切以党的事业、国家的事业为重，这正如老人家里墙上挂的那幅字一样：淡泊以明志，宁静而致远。

记者手记

在北京的国家级单位工作过，也在焦作工作过，相信任久利能感觉到煤城与京城在生活条件、工作环境上的落差。但当他认为焦作的档案工作更需要他时，任久利义无反顾地放弃留在北京

工作的机会，举家落户到太行山脚下的煤城。这种选择、这种舍弃，是一种无私，是一种忘我，是一种襟怀，是一种人格。

从“雨果奖”起步，迎接科幻文学的春天

□何勇海

近日，在美国华盛顿州举办的2015年“雨果奖”颁奖仪式上，中国科幻作家刘慈欣的长篇科幻小说《三体》获得最佳长篇小说奖，创造了中国科幻文学的新纪录。这也是亚洲人首次获得“雨果奖”。刘慈欣在获奖感言中表示：“自己曾读过许多‘雨果奖’得主的作品，‘雨果奖’是科幻界的一座灯塔。”

“雨果奖”确实是科幻界的一座灯塔，其正式名称为“科幻成就奖”，是为纪念“科幻之父”雨果·根斯巴克而设立的。在世界科幻界，由世界科幻协会颁发的“雨果奖”，和美国科幻奇幻作家协会设立的“星云奖”，被认为是具有权威和影响力的两项科幻大奖。

刘慈欣荣获“雨果奖”，不仅为中国科幻文学，而且为亚洲科幻文学写下了光辉的一页，可喜可贺。

有人因此认为，中国科幻文学已经提升到了世界级水平。我觉得，这种说法还为时过早。正如刘慈欣日前现身2015上海书展时所说，当代中国文学最大的问题是与科学脱节，有人把中国文学界称为最大的科盲群体，并不是因为他们本身就是科盲，而是他们对科学没有兴趣；作品也好，作家也好，都缺乏影响力，不能因为一两部作品成功，就说中国科幻文学达到了世界水准。

刘慈欣的这种认识才是清醒可贵的。在我国，科幻文学仍然是小众、边缘化文学。一方面，科幻文学创作者少，在国内外有广泛影响力的科幻文学作家更是少之又少。一些作家热衷于创作毫无科学基础的穿越文学与奇幻文学，一些读者更是热捧这些文学“大路货”；另一方面，一些作者即使致力于创作科幻文学，却因为想象力匮乏，缺乏创意也缺乏思考的深度和锐度，致使不少作品较为粗糙，甚至还处于简单的模仿阶段。

在我国主流文学评论界，科幻文学有时也颇不受待见，有人看重科学性作品的文学性，有人看重其科学性，有人认为科幻只是工具，充分表现人性的科幻文学才称得上文学，有人甚至认为科幻文学表现的是伪科学……

科幻文学和主流文学存在的这些分歧，致使其评价标准多元，际遇也就不尽相同，一些作家因此不愿进军科幻文学创作。

刘慈欣荣获“雨果奖”，并不能证明中国科幻文学成功“逆袭”，只能说明，在世界科幻文学蓬勃发展的背景下，向前展望，中国科幻文学有很大的希望。它的真正繁荣振兴，需要一大批像刘慈欣这样有影响力的作家共同努力。当今社会是由日新月异的科技革命来推动和主导的，科幻文学大有可为。我们的科幻文学作家不妨从“雨果奖”起步，共同打造和迎接我国科幻文学的春天。

微话题

百家联盟是实现跨行资源整合，商家联盟推广的平台，与各大行业实行买酒即送100元现金券。批发原瓶进口红酒，茅台集团雷酱万寿、五粮液百鸟朝凤等高档白酒。

地址：焦作市人民路报业国贸513
电话：(0391) 3582899



【今日话题】

打坐代替午睡

新学期一开学，广东省佛山市树本小学要求小学生们午休时不能上床睡觉，而是原地在教室盘腿打坐。学校在通知中提到，打坐午休是学校的一项新尝试，将由校长亲自教学和示范。该校副校长表示，目前打坐午休只是一个尝试，一个月后根据效果再决定是否继续。不过校长说，他自己练习打坐20年，觉得效果非常好，希望可以在学校推广。打坐代替午睡后，有学生表示比较累，脚比较痛；不过也有学生反映打坐后全身很放松。

年，但对发育期的学生来说未必得当。不会休息的人就不会高效学习、工作。学校在搞好教学的同时，也应该保证学生的睡眠质量，不要拿学生当试验品，凡事都应讲科学。

②爱莘之人：笔者认为校长创新午休方式的初衷是好的，只是不应该统一要求学生去打坐。

③时光一渐渐消失94120：这位校长也是出于好心，大家不要说得那么难听。

④爱商顾问钱飞君：打坐练习会出现腿酸、麻、痛等情况，一般人很难坚持练下去。但是，只要坚持打坐，就能起到强身健体的作用，重要的是，打坐可以提高学生的注意力，避免他们上课分神。所以，我认为循序渐进的打坐练习可以尝试。

【观点1+1】

①暖暖小月儿：校长的职责是关心学生成长，而不是损害学生健康。学生上课坐一天本来就很累，中午再接着打坐，不利于学生休息，这种创新不科学。作为校长，更应该考虑如何提高教师的工作积极性，而不应该抓这些鸡毛蒜皮的小事。

②宿松何晓：中国的教育怎么了？校长的创新尝试科学吗？打坐能提高学习质量吗？校长以一人之好恶，强加于众人，真不应该！

③我很丑其实我很二：暂且不论打坐午休对发育中的孩子是否有利，仅以成年人的思想强加给孩子来看，就说明该校不能因材施教，是工作的失职。

④单建华江苏：此举有点无厘头。打坐代替午睡可有科学依据？校长可能对打坐情有独钟，但不能把个人的喜好强加于他人。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，不是个人爱好的自留地。

⑤眉心所动：教育难在创新，贵在创新，但创新不能违背客观规律，更要有科学依据。如果学校仅凭某个领导的经验和喜好搞创新，学生的正常权益如何保障？

⑥芳心云天：适合的才是最好的。这种“打坐代替午睡”的午休方式，对校长来说也许是最好的，因为他练习了20

年，但对发育期的学生来说未必得当。不会休息的人就不会高效学习、工作。学校在搞好教学的同时，也应该保证学生的睡眠质量，不要拿学生当试验品，凡事都应讲科学。

②爱莘之人：笔者认为校长创新午休方式的初衷是好的，只是不应该统一要求学生去打坐。

③时光一渐渐消失94120：这位校长也是出于好心，大家不要说得那么难听。

④爱商顾问钱飞君：打坐练习会出现腿酸、麻、痛等情况，一般人很难坚持练下去。但是，只要坚持打坐，就能起到强身健体的作用，重要的是，打坐可以提高学生的注意力，避免他们上课分神。所以，我认为循序渐进的打坐练习可以尝试。

【下期话题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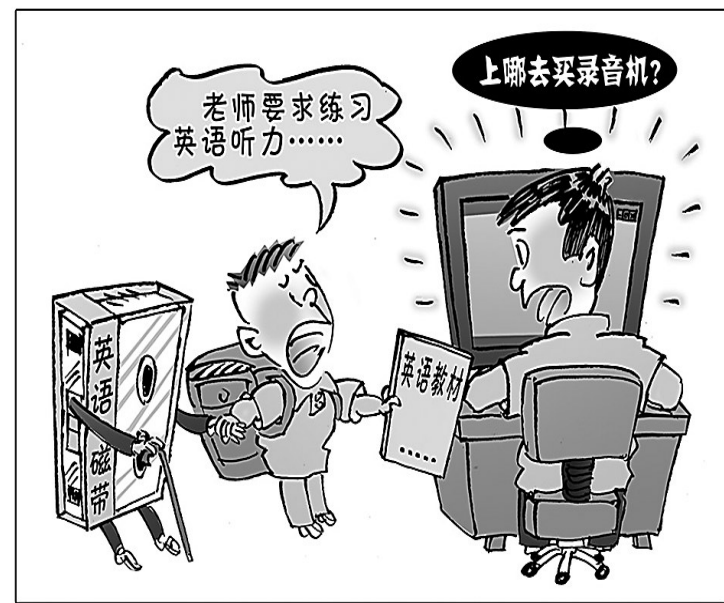
孩子该吃什么苦

近日，南京市六合区某高中新生军训嫌累，居然报警求助，引起各方不同反应。不少家长认为，如此军训孩子吃不消，这样的吃苦没有必要；一些教育界人士则认为，军训是锻炼孩子身体素质、磨炼意志品质的大好机会。大家围绕该让孩子吃什么苦争论不休，对此，你怎么看？

（参与热点话题讨论，请关注《焦作日报》官方微博@焦作日报）

本期栏目主持人 本报记者 麻酷

世相漫话



“难题”

近日，全国中小学相继开学。然而，孩子带回家的英语磁带，令不少家长发了愁，如今，卡式录音机已从家庭日常生活中销声匿迹了，上哪去买录音机？一些家长吐槽：“现在都信息化时代了，还用磁带教学，太落伍了。”

跃新 作 (新华社发)

“不让好人吃亏”应是一种道德自觉

□吴龙贵

四川绵竹的哥付师贵在当地出租车界出名了，而他本人却很委屈。8月27日早上，他拉了一个乘客，对方将一个包遗落在车上。为了还包，付师傅先后跑了3趟车，收了对方65元车费。然而，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，先是失主的朋友爆料称，付师傅曾索要120元钱；随后，绵竹当地一微信公众号发表了一篇题为《网曝：绵竹一出租车司机涉嫌敲诈乘客！行为太恶劣！》的报道，将付师傅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。

乘客丢包，出租车司机先后跑了3趟车还送，原本是一桩拾金不昧、助人为乐的佳话，不曾想却因资费问题而产生纠纷，做好事的出租车司机不仅没得到一声“谢谢”，反而落得个“敲诈乘客”的恶名。不少围观此事的网友表示，如果做好事是这样的下场，今后谁还敢做好事？

这样的反应或许有些过激，但此事确实给人一种“好人未得好报”之感。我国《物权法》第112条明确规定：权利人领取遗失物时，应当向拾得人或者有关部门支付保管遗失物等支出的必要费用。如果付师傅扣着失主的包不还并且漫天要价，当然有敲诈嫌疑，但事实

上，付师傅为了送还乘客丢失的包，先后跑了3趟车，从日常经验上说，即便与实际车费不符，恐怕也出入不大，收取65元车费显然是合理的。

这件事告诉我们，即便到了今天，某些人身上的“道德洁癖”依然根深蒂固。在他们看来，做好事就意味着必须无私奉献，否则好事就变成了坏事，道德就会打折和贬值。这件事中，失主为几十元的车费而斤斤计较，无非是这样的逻辑：你既然做了好事，干脆就好事做到底，一旦谈回报，你就理亏了。这不仅仅是一种“道德洁癖”，更是一种自私自利的表现，好像别人做好事理所当然，自己得好处天经地义。道德的滑坡，很多时候正是缘于这种“好人必须吃亏”的心态。

在我看来，一个人做好事，不仅可以理直气壮地索要为此支付的成本，而且我们应该倡导和鼓励受益者给予对方一定的额外报酬。不让好人吃亏，让好人从善行中获益，不仅是对善心的一种回馈，有利于形成正向激励，而且提醒我们每一个人，不要做冷漠的受益者。为他人的善行“点赞”和“打赏”，其实是我们的道德义务，应该成为我们的一种道德自觉。